

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

——校友回忆录

孔本翟 主编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杰出的中国医学教育家

——记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福庆教授 戴天石(1)

纪念老院长宫乃泉恩师 谢 震(6)

心中不倒的红旗

——深切怀念敬爱的陈同生同志 郭晓燕(7)

怀念朱恒璧老师 顾学箕 王士良(黄志尚)(19)

师道垂世

——纪念黄家驷教授 石美鑫(28)

沈克非教授在创立我校神经外科中的功勋 史玉泉(31)

忆计苏华同志 聂崇铭(方春望)(36)

纪念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和创始人颜福庆院长

..... 吴之理(41)

怀念谷镜汧老师 顾学箕(46)

缅怀谷镜汧教授艰苦创业精神

——为纪念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周年校庆而作 郭慕依(50)

教书育人的楷模

——忆著名医学教育家齐登科教授

..... 王穆兰 左焕琛 齐振生 金为翘(56)

纪念爱国主义者郑兰华教授 章央芬(63)

缅怀我们的好领导陈同生同志 赵 挥 谢 震 李 德(66)

忆陈同生院长 钱熙国(76)

怀念朱镇亚同志

- … 蒋兴权 吴 经(吴 合) 王道佩(苏 新) 袁耀普 王赞舜(80)
- 建设西藏回来的赤子庆贺母校七十诞辰 …… 褚黛丽(88)
-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记事 …… 钱 惠(94)
-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 王乐三(101)
- 变革——学术进步与学校发展的源泉
- 贺母校七十周年校庆 …… 汤钊猷(106)
- 坚持继承发扬上医的优良传统与校风
- 为庆祝上海医科大学建校七十周年而作 …… 陈海峰(110)
- 1939 届同学的回忆和汇报
- 献给后来的校友们 …… 张丙辰 马龙瑞 朱既明(116)
- 药科创建二三事 …… 王振铎(128)
- 上医与军事医学科学院 …… 程 违(136)
- 战斗中锻炼 学习中成长
- 侧记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第二届同学
- …… 徐 达 程 立 王 朱(140)
- 上医地下党生活点滴 …… 吴 经(吴 合)(143)
- 解放前夕的上医 …… 钱振超(150)
- 红旗制药厂今昔 …… 郑艳秋 沈 卫 胡赛娣(155)
- 中国医学检验事业的奠基人叶应妩教授 …… 陈宝梁 杨树德(161)
- 记循环障碍性疾病研究的一代先驱祝寿河教授 …… 任世光(164)

杰出的中国医学教育家

——记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福庆教授

戴 天 右

颜福庆教授字克卿(1882~1970年),上海市人,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1882年生于上海郊区江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资助培养。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曾先后赴英国、美国、奥地利等国深造,获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9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 D. T. M. 学位(1910年),第二次出国又获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 C. P. H. 学位(1914年)。早年他到过南非一个矿山为华工治病。嗣后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从医,参与创办湘雅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前身)。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在京汉铁路沿线参加防治工作,不久又到江西萍乡煤矿从事钩虫病调查及防治工作。1918年和1920年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关于钩虫病流行病学及防治工作论文各一篇。

自1914年第二次从美国回国起到1927年十余年间,他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致力于医学教育工作。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强调真才实学。国内不少老一辈的医学专家,如张孝骞、应元岳、汤飞凡、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沛

吴绍青、张维、李穆生、董秉奇、姚克方以及美籍病毒学家李振翩等，都是颜教授早年在湘雅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湖南时期他从爱国热情出发，联合上海一些医务界前辈，发起创立“中华医学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不久又将由教会医院外籍医师所组织操纵的“博医会”合并过来，成为我国自己的医学学术团体，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混乱时局中，湘雅医学院与其他一些大专院校同遭厄运被迫停顿，颜教授被调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他看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势力占据了我国医学教育整个阵地，决心创办一所由国人自主的高等医学学府，遂即联合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在上海筹划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经多方联系，积极筹备，勘定吴淞校址，于同年9月筹备大体就绪，由当时接办的江苏医科大学预科二年级学生9人，连同湘雅、圣约翰和北平协和等医学院的转学学生共29人，编成一、二两个年级，即宣布正式开学。同时多方物色人才、筹办仪器设备，加以扩充。经商得中国红十字会同意，将该会在上海的总医院接办为教学医院（即华山医院前身）。为了进一步扩展临床教学医院，颜教授四出奔走，筹募资金。1936年在枫林桥兴建的校舍大楼和中山医院落成，其余附属建筑及师生宿舍等亦相继竣工。后又在江湾捐得“澄衷花园”辟为肺病疗养院，附设儿科部，作为教学医院之一（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前身）。至此，国人自办的医学学府已粗具规模。在当时旧中国混乱的社会里，克服艰难阻挠，冒着连年战争烽火，辗转迁徙，惨淡经营，但始终不渝地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在师生中蔚成艰苦朴素、勤奋钻研的学风。他为

祖国培养了一批批的医药卫生技术人才,其中不少已成为医学科技专家,更多的成为医务骨干力量。这在当时旧社会的确得来不易。

颜教授的预防医学思想,贯穿在他办学的实践中。他在上海医学院创办之初就组建公共卫生科,除亲自参加教学外,在第一批专任教师中,就延聘我国第一位获得公共卫生博士学位的胡宣明任教授,继又先后聘任梅贻琳、张维、赖斗岩、黄子方等早年国内有声望的公共卫生学者担任教职。此外,在创校时即建立吴淞卫生模范区,以后又陆续建立高桥、新闸、嵩山、嘉定及内地的曲靖、璧山、砂磁等卫生教学区。课程中除开设公共卫生必修课外,还规定毕业班有1个月的公共卫生生产实习,始终坚持未曾间断,从而促使不少品学兼优的医学本科毕业生很早就选定公共卫生为自己终身职业,在我国卫生建设事业中做出贡献。

颜教授还一贯提倡“公医制”,反对个人开业,坚持教师专任制。他以身作则,从来不私人开业,在他的影响下,医学院树立了埋头业务、不逐名利的优良传统。1927年前后,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分别发表了建议组织我国中央卫生机构的论文。1935年撰写《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经济财政管理》和《中国医学教育的过去和现在》等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这个时期他被选任为教育部和卫生署合组的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外,他经常积极参加红十字会、卫生防疫、麻风防治、防痨、妇幼保健等方面的社团组织领导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颜教授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发动和组织医疗救护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全国解放后，颜教授亲眼看到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在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单就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发展情况来说，就远远超过他早年以国立上海医学院及中山等医院为基础建立“上海医事中心”的设想。他认识到，他的理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他怀着满腔热情，兢兢业业投身于祖国医学教育建设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动员和组织工作，并亲自参加慰问团到东北慰问志愿军战士。建国十周年他撰写了《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文，刊载于英文版的《中国建设》。

颜教授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勤奋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建国后，他一直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他在晚年精神更加焕发，仍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社会活动。他曾多次受到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82岁那年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亲聆周总理的报告，对总理提出的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宏伟计划，感到无比兴奋、激动，更加勤奋工作和学习，誓在有生之年更好地为人民和医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但是，事与愿违，在“十年动乱”中，他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70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颜教授一生对医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

入我国医学史册。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努力学习、不断提高的思想作风,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

(本文作者为 1933 届校友,原任本校教务长,公共卫生学教授)

纪念老院长官乃泉恩师

谢 震

巍巍官院长，华夏白求恩；
手不离书卷，心常怀国民。
文章扬四海，桃李遍三军；
人去雄风在，千秋效典型。

(本文作者为 1961 届校友，原为本校华山
医院副院长)

编者注：官乃泉 1949 年 8 月任我校临时管理委员会主任，1951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2 月任解放后第一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他是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军事医学家、战伤外科专家、出色的卫生工作领导者。1910 年 8 月生，1937 年参加新四军，1940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5 年 4 月病逝，终年 65 岁。曾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华东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心中不倒的红旗

——深切怀念敬爱的陈同生同志

郭 晓 燕

每逢校庆，每谈往事，每当我回顾成长过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敬爱的陈同生同志。他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的痕迹是那么深邃。他是我们心中不倒的红旗。

他们 都是 国宝

同生同志十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对上医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是看作革命对象，而是与他们交朋友。他常对干部说，办社会主义医学院，一靠党的领导，二靠专家和教授，这批专家教授是上医的宝，是国家的宝。他常举例说：黄家驷教授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过去要开业发财是很容易的，但他为了事业，让夫人辞去工作照顾两个患哮喘病的孩子。杨国亮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皮肤病专家，在旧社会工资微薄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接济过我党的活动。能说这些人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吗！他要求党政干部“兵对兵”、“将对将”地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他们，了解他们，依靠他们，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他自己更身体力

行,常常利用假日主动到教师家里去,一杯清茶,促膝谈心,与知识分子交知心朋友,坦诚相见,肝胆相照。他从不训人,而是以诚服人,给人以亲切感。由于他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大家都愿意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他善于同知识分子合作共事,上医的副院长、教务长、教研组主任大都是非党人士,同生同志十分尊重他们的教学、医疗、科研经验,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大胆放手,在重大问题上共商决策,从不包办代替。他常对干部说:上医的专家都是宝,他们爱国家,爱人民,不挂牌赚钱。他们做出成果,有了名气,是辛勤劳动得来的,他们是真正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

颜福庆先生,从1927年起,倾注了30多年心血,创办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有重大贡献。在纪念建校三十周年时,同生同志建议为颜老编写小传,并请求表彰颜老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的贡献。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上述主张,曾受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指责。此事虽未办成,却表达了他尊重历史、尊重知识分子的心愿。

重要的是理解人关心人

同生同志常常深入到各教研组关心教师的工作。凡教师、专家找他,再忙也要抽身接待,听取意见。对知识分子个人有什么要求,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例如,受聘的几位中医,来院工作后有的收入减少了,他就要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又如有两位从美国归来的医师,子女多,经济有困难,他要有关部门给以定期补助。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

解释说,他们能从美国回来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他们一时不能适应国内生活,我们应该容许有一个适应过程。他还对干部说:知识分子如有经济困难,一般不会提出补助要求,我们要主动关心他们。在他的主持下,党委对有关部门作出了应主动关心收入低生活又有困难的分子的决定。当时有人片面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工资高、住房好”,同生同志耐心地做工作,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只有让知识分子无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全身心地为国家工作,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为了改变专家、教授在大饭厅排队就餐、伙食又差的情况,他与膳食科研究,为专家教授开办小食堂。而他自己却从不到那里去进餐,经常在职工学生食堂与师生员工边吃边谈。在三年困难时期,同生同志缺乏营养,身体浮肿,但他很少考虑自己,却要膳食科把猪肉、黄豆送到教授、专家和有病的干部家中,使人们深受感动。他还为改善教授的住房条件而到处奔走,亲自跑房管部门,使一些教授住进比较宽敞些的房子,郭秉宽教授常向人说:“在整风反右大浪潮中,我曾直言不讳地发言,遭到非议。陈同生同志善意地劝告我,在公开发言时要克制自己,以致我能幸免于难,陈同生同志的及时劝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同生同志还将有关部门分配给他的一套公寓住房转让给我,而他自己则迁至同一公寓内面积较小的底层。陈同生同志对我生活起居关怀备至,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永志不忘”。

同生同志很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他不允许干部随意将教师找到办公室来,教育干部如有事要到教师中去,不能打扰教师的工作。如邀请教师参加会议,要在通知时说明:教师如有重要工作抽不出身,可以

请假。每逢召集教师开会，他自己总是尽可能参加，而且从不迟到早退。对于少数干部群众有不尊重知识分子的言行，他总予以严肃的批评，诚恳的教育。

甘冒“右倾”风险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同生同志甘冒被视为“右倾”的风险，竭力保护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肃反时期，他慎重掌握政策界线，保护了一些在旧社会为谋生而有过这样那样政治经历的人，没有伤害他们与我党的感情。在反右时期，他抵制“左”的做法，保护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一次，有人将大鸣大放会上的发言稿拿去，企图作为批判“右派言论”的依据，同生同志得知后，当夜追回，使一些同志免遭打击。

1957年后，出现了“左”倾干扰，从反右扩大化到批“白专道路”，从“拔白旗”到“反右补课”，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同生同志总是讲党性，顶风雨，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因此，他曾多次受到当时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指责，使他在上医的处境很困难。1957年上医校庆前的一个晚上，市委主要负责人将陈同生和王乐三（当时党委副书记）一起叫去，训斥说：“我已看到你们的校庆小册子，为什么这样纪念校庆？不强调我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倒是把旧上医说得那样好，估价太高了，这本书不能发”。其实，那本校庆小册子反映了上医30年走过的历程，第一部分是一些照片；第二部分是上医30年大事记；第三部分是学术活动的安排和医学科学论文的题目，本是无可非议的。在反右斗争初期的一个白天，还是那位市委主要负责人，又把陈同生和王

乐三一起叫去，当时同生同志正住院，是请假出来的。刚进门，那位负责人声色俱厉地说：“你们看不看报？全国、上海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你们为什么按兵不动？”，“你们上医有那么多卫生官，又有那么多大字报，就没有右派？”并当场点了两个人的名。在回来的路上，同生同志感慨地说：“过去，这些人还有点民主，现在怎么这样霸道！”此后，他的血压更高了，人虽住院，但经常询问一些老专家、教授的健康状况，并叮嘱说：“不能过分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要团结他们”。1961年9月，中央批示在高校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3月，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召开科学工作会议，他们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劳动者，应该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个会议精神传达后，同生同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王乐三同志并转党委诸同志。信的大意是：这次广州会议开得很好，中央现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后我们工作更好做了。不久，在一次为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甄别大会上，他代表党委作检查，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犯法，有了罪，可以判刑，但不能侮辱他们的人格，中国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啊！”这些话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反应极为强烈。

言传身教培育青年

同生同志很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1959年，他住医院期间，尽管背部还有些僵硬，手腕不能转动自如，还是写下了回忆录《不倒的红旗》一书，这不仅是他对牺牲

的同志深深的怀念,也是他对青年同志殷切的期望,教育年轻一代“革命成功来之不易”。他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亲自到食堂看饭菜,到宿舍检查卫生。他对学校一年一度的开学迎新、一年两次的温课迎考认真布置外,总要亲自参加检查,例如新生入学前,他不仅听取汇报,了解各部门工作落实情况,还带领机关和后勤有关同志,深入实地检查。开学后,他又带领有关同志或独自到教室听课,了解学生学习思想情况。

他对干部既严格又热情诚恳。谁有缺点错误就当面批评,从不在背后记账;干部如果改正了,他又给予鼓励。他对人宽,对己严,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光明磊落地剖析自己,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或委过于人,因此大家都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能够有所作为。

1955年6月,同生同志刚调到上医时,我任校团委书记,当时我虽有满腔的热情,但工作中缺少办法,对全校团的工作缺乏全局性、战略性的思考,工作小手小脚,打不开局面。对此,陈院长没有丝毫的指责,而是采取了武装我的思想,引导我开阔思路,对我的任务升格、压担子的做法。

陈院长常对我说:“上医是一流的大学,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以勤奋努力换来的,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凡是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应具有一流的水平。党调我来,要求我成为一流的党委书记,也要求你成为一流的团委书记。”此后,每当想到要争取这个一流干部的目标时,就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驱使我勇敢向前。

陈院长经常讲:“大学要为国家培养一代新型的医药卫生人才。这新的一代要胜过以往任何一代,也要胜过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共青团要当好党的助手，把这个任务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

陈院长送给我一张珍贵的照片，指着上面三男一女对我说：“这是我党早期工农青妇的领袖，工是邓中夏、农是毛泽东、青是恽代英、妇是向警予。现在有三位已英勇牺牲，只有毛泽东健在。牺牲的同志，他们举起红旗，后世的人永远会怀念他们，应该继承他们未完成的遗志奋勇前进。”他在病榻上写了《不倒的红旗》一书，以纪念牺牲的烈士们，并勉励一代一代的青年将红旗永远高举下去。书出版后，他赠给我一本，我一直视为珍贵的礼物，用牛皮纸将封面包好，时刻翻阅，并借给许多青年朋友阅读过，书虽然翻旧了，可书中的英雄人物，却令人常阅常新。可惜在“文革”中抄走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看陈院长的夫人张逸城，正巧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不倒的红旗》，并由陈院长的好友们充实了部分内容。她知道我喜欢这本书，当即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写上赠送字样送给我，我高兴极了，像重又获得了一份珍宝。回家后，立即将书皮包好，当晚一口气重新阅读了一遍，看到尾页，已是东方欲晓，可一点倦意也没有。

一生坎坷犹奏“东进序曲”

过去，和陈院长在一起工作的 10 多年中，很少听他谈自己的事，我也从未问过。当他在“文革”中不幸遭难后，却使我强烈地想了解陈院长的一生。我拜访他夫人张逸城时，冒昧地提了许多问题。张逸城同志不厌其烦地一件一件地讲述给我听，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了解了

许许多多,使我对陈院长更加深了崇敬之情。

同生同志 1906 年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原名张翰君,后在对敌斗争中多次更改姓名,其中陈同生、陈农菲这两个名字用的时间最长。他周岁那年,全家随祖父迁居四川省营山县。1924 年 18 岁时因参加张澜先生领导的抗捐运动,差点被当地军阀杀害。脱险后,流亡到成都,在那里,他得到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最早的领导人刘愿安、黄映湖、何肇禹等同志的引导,同年 9 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6 年,同生同志到重庆,进入吴玉章、杨道融同志主办的中法大学读书,在这年 1 月的李卜克西、卢森堡、列宁纪念周,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勾结四川军阀刘湘等,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同生同志在这次惨案中受了伤。伤愈后,转到川军部队中搞地下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他到广东,参加了广州暴动,继而进军东江。

1928 年秋末冬初,为开辟新根据地,党组织决定调东江红军干部经香港派往各地。同生同志被调去从事地下工作。他到香港后未能接上组织关系,经一年多漂泊,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党,随后被派到成都。

成都是同生同志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先后当了《日邮新闻》、《成都快报》和《新蜀报》的记者、编辑、总编,也曾在国民党 28 军任职,在这些公开职业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后因一位同志不慎,经邮局给他寄党的传单,被敌人查获,不得不离开四川,前往上海。

1932 年秋到达上海,先后在“社联”、“文总”、“济总”